

# “红楼”即便“说不尽”，解读也要有底线

■ 田志豪

最近，各类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上，围绕《红楼梦》展开的相关讨论，话题热度持续攀升。《红楼梦》自面世以来，一直备受关注，嘉庆年间的文人得舆在诗作中感言“开谈不说红楼梦，读尽诗书也枉然”。今人对这部小说也是言谈不倦、聚讼不已。作者在起首自明“真事隐去”“假雨村言”的叙事纲领，再辅以“梦幻”“荒唐”等定性表述，似乎本就有意模糊虚实的边界。至于“草蛇灰线”般的叙事伏脉、“金陵十二钗判词”等诗词谶语、“元迎探惜”一类的谐音命名等，也在留下线索的同时，又难以究极毫奥，引来无数遐想。况且说千道万，《红楼梦》毕竟不是一块“完璧”，文本的残缺虽令读者倍觉遗憾，却也为大众的解读与联想留下了更多空间。

历史上针对《红楼梦》展开的批评视角向来多端，从清人王希廉的“劝诫说”，到民国索隐派的“悼明说”，考证派的“自叙传”，再到当代的社会学视角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，可以说，整个《红楼梦》阐释史就是一部不断被重构的历史。而在其间，索隐派与考证派的论争又格外引人注目，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，成为经典著作阐释中各执一见、反复争鸣的代表案例。

提到索隐派，学界一般公推蔡元培《石头记索隐》为代表。《石头记索隐》提出此作是一部“政治小说”，作者“持民族主义甚挚”，意在“吊明之亡，揭清之失”。这样的解读，除了本于《红楼梦》文本意义具有开放性的大前提，大概也受清代文祸频发这一外部环境的催发。蔡氏说明著书动机时就提到，小说作者“虑触文网”，故意造设了“数层障幕”，于是很有“阐证本事”的必要。在人物关系上，宝玉对应康熙的废太子胤礽，黛玉影射朱彝尊。蔡氏这番以“文”索“史”的用力，却还是被胡适以猜“笨谜”“附会”等相讥，如此难免胸中不平。他在《石头记索隐》的“第六版自序”中归结出“三法推求”，“自以为审慎之至，与随意附会者不同”，又举隅中外多种“情节考证”事例辩议道：“然则考证情节，岂能概目为附会而排斥之？”似乎是想从文本细读的角度，证明索隐派数的学理性。归根结底，所谓“情节考证”的方法，“基本方法无非是比附、谐音或拆字”，难以脱卸臆断、附会的嫌疑。概因如此，索隐派才在当时

与考证派的学术论争中败下阵来，逐渐被红学边缘化。

时下，“悼明说”再次引发争议，其背后的原因为什么呢？不妨从小说文体的角度来一探究竟。

作为传统文学体系中的非主流文体，遭到贬抑是小说面临的长期处境。这种情况下，擎起“实录”的大旗、标榜“补史之阙”的价值，成为作家与批评家为小说正名、辨体时的一种普遍策略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小说攀附在“信史”身旁腰杆才硬，身形才高大，价值才能彰显。可以看到，一些载录实事的笔记体小说，确实也被古人当成博洽淹贯的凭据，甚至被引作治史的资材。小说文体所表现出的这种“执念”，往大处说，映射出的是中华民族慕史求实的文化品格。从“索隐派”将小说当成“史”来解读的尝试，到今天广大网友对《红楼梦》“悼明说”的勃勃兴致，叩问历史真相的用心是一贯的。文学的模糊性固然是其魅力所在，但在无形中催生出读者的焦虑之源。于是，该话题与许多对历史真相感到好奇的公众，特别是年轻一代一拍即合。他们试图基于《红楼梦》，运用自己接收的信息、秉持的情感与价值观，对历史和文化作出新的阐释。

另一方面，虽然有一股强力的“尚实”观念制约，但小说在还归于子部、史部的观念史早期阶段，就已将“姑妄言”“子不语”“虚述”“好奇”等基因深植于认知图式之中，即便日后小说文体趋于独立，“虚”“奇”成分也仍然相对稳定。像张华《博言志》、洪迈《夷坚志》、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等小说著作，即便因为传述圣人所不语的“怪力乱神”而屡遭正统文人批驳，但从不见泯灭，这其中当然有作家与批评家的功劳，他们或是标榜“庶几乎史”“羽翼信史”，或退而强调小说的“资谈”“消闲”等功用，或是以儒家“玩物适性”观念寻求情理支撑。但这种种举措，终究无法遮蔽小说在传虚、传奇上的审美癖好。读者大众对小说的接受就更自如，往往越是捕风捉影的异闻怪谈，越受读者大众的青睐，也容易流布于街谈巷议的话语场域之间。“悼明说”在当下引来众多拥趸，内在理路恐怕与此也不无相通之处。人们对神秘、反常、隐晦事物的探索欲与好奇心膨胀，进而表达成对反常叙事的偏爱，而《红楼梦》的



1987年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剧照

这一解读恰恰能与这种喜好相投契。对于部分人来说，承认这是一部描写男女情爱、家族兴衰的小说未免过于平淡，但如果说这是一部见证宫廷秘史的隐喻之作，阅读的刺激感、新鲜感则远超前者。

“悼明说”延续了“索隐派”的旧阐释范式，本来新意并不多，在当下能火爆，和互联网的推波助澜脱不开关系。凭着低准入性、便捷性、瞬时性等特性，互联网对学术圈以外的社会群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赋权。过去需要通过专著、论文才能看到的索隐观点，如今被压缩为数十秒的短视频输出到亿万接收终端。不仅如此，算法对争议性内容的偏好，让一些博人眼球的解读更能引起评论区的激烈对撞，得到更多推送。流量倾斜下，相关的讨论更成了一匹脱缰之马，一发而不可控，演变为一种“万物皆是悼明之作”的玩“梗”，

出现了“道明寺 = 悼明事”“小红书是悼明之作”这样不着边际的联想，并在网络媒介上迅速复制与传播。其脑洞之大、花样之多，早已经超出《红楼梦》这一话题范畴，大概也远远超出了“红楼悼明说”铁杆支持者们的想象。

“嗜奇”与“求真”本可激发大众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，进而转化为增强文化自信的积极动力。但若为追求猎奇效果而强行嫁接文本与历史，任由娱乐化态势蔓延，经典文学的固有价值必将随之消解。古典文学植根于自然之道、人文之道，承载着对人性、社会、宇宙的根本洞察，绝非单纯的史料载体或密码容器。《红楼梦》的核心是揭示“悲金悼玉”的人性悲剧，是对我族兴衰、礼教桎梏下个体命运的哀叹。索隐或可作为解读的辅翼，丰富文本意蕴，但若让其居于接受视野的主流，不仅会让一部经典沦为短期消费的文化



工具，长此以往，我们对文学本质的感知能力亦将减退，甚至失去。

在此次围绕《红楼梦》的各类解读中，许多网友的观点、言论越出了合理的边界，出现了过度解读的趋向，不仅滥用了文学经典，也解构了严肃的历史。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信息传播载体，重构了文学经典解读的参与规则与扩散机制。在算法主导的信息茧房之中，持不同见解者之间隔阂重重，即便有专家学者出面对这些谬误作出澄清，也难以被部分网友接受。部分网友秉持“欲盖弥彰”的阴谋论思维、“非黑即白”的二元对立立场，始终沉浸于自己观点的闭环之中，却没有充分估量理性发声所带来的代价。

从《红楼梦》再上溯千年，刘勰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篇的论述尤有余音，“凡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”“无私于轻重，不偏于憎爱”“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”。这些论述或可给“红迷”们带来启迪，亦能给围观者的燥热情绪“降降温”。

（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）



## 青推荐



小说集《牧马河之夏》：

### 展现“故事的疗愈力量”

■ 邓 瑶

《牧马河之夏》是邹世奇的第一部小说集，此前她在报纸上发表过随笔、杂感，收录于本书中的大部分作品也曾在各文学杂志和刊物上亮相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该小说集的出版既意味着邹世奇真正以作家的身份登上文坛，也意味着一种反思与重审，即对过去写作的回顾与总结。

邹世奇是一个在写作上个性较为鲜明的作家。她已有的作品数量虽不算多，却在语言风格、叙事节奏和题材内容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。作为与小说集同名的作品，《牧马河之夏》可谓邹世奇创作的题眼。小说写一位南山镇小学的年轻教师竹青和一群“三下乡”的大学生们度过的难忘的夏天，叙述上充满诗意和青春气息。作为小说核心意象的牧马河，既有一种感人的美，又暗藏着满目疮痍与危机。同样的，小说的情绪是复杂的，一面是对青春往事的追忆，一面是揭开现实的疮疤，将看似纯洁美好的感情放置在世俗层面上考量。“牧马河之夏”是竹青人生的转折点，凝聚了她的美好回忆，也沉淀着巨大的伤痛，成为她后来蜕变的一个原动力。这篇小说蕴含了邹世奇现实题材写作的基本元素。无论是《看见彩虹》中的小晗、《琉璃》中的琉璃，还是《阳光绿萝》中的谢书雯、《原点》中的清如、《让我住在裙子里》的佟丽、《透明女人》中的小丛等，都有竹青的影子，她们经历了共同的命运，发出相似的声音，如同一个女性的自白。

小说集所关注的话题，首先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心理创伤。《琉璃》《看见彩虹》《透明女人》等小说道出了组合家庭里失去生母的女孩的遭遇，琉璃将童年时受到的虐待，化为长大后对亲人的讨好，使她丧失了真实的自我；小丛承受着继母的冷暴力，因自卑而失去了很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。《阳光绿萝》表现了父母对不同儿女的偏心。“阳光绿萝”本是很温暖明朗的意象，却在作者笔下覆盖着原生家庭的阴影：“只要一茎绿叶，不需要有根；扦插或水培，只需小

半杯水，甚至连一捧土都可以不要，便可随处垂下一片绿茵、一丛绿色的瀑布。”绿萝顽强的生命力，是不受关爱后的一种自救，这是对人物命运的隐喻。

邹世奇笔下的女性，大多为富有才华、不甘平凡之人，她们清高、骄傲，却受困于与其自身能力不匹配的位置。佟丽为家庭所累，工作后节衣缩食，在都市中如同一叶无处扎根的浮萍；小丛工作感情双双失利，既无法在工作中找到认同和成就感，失业的男友又卷走了她的全部存款，甚至让她险些失去继续活着的勇气。这些小说都在描写人物的受困，而人物之所以落入如此境地，很多时候都与原生家庭有关。尽管她们身处泥淖，却仍仰望着星空。

邹世奇的小说主要写现实中的受困与不甘，穿插以童年的回忆，结尾则实现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超越，人物至此完成了心理上的蜕变与成长。竹青被沈岩抛弃后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在众人的冷笑与幸灾乐祸中走出了更宽广的人生；琉璃勇敢放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背负着骂名，做出了自己真正想要的选择；清如失去了爱情，却收获了写作上的成长，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；小丛逐渐接受了生活的磨难，最后在工作与感情上越发从容裕如。

当然，伤口痊愈了，伤痕仍在。谢书雯在成为大学老师后，仍对过去的经历心有余悸：“你只看到我现在的学历，但你没看到我的中学是中师，我当过四年小学老师，大学是自学考试，读硕士、博士是公费加上奖学金和勤工俭学。”她们也许走出了当初的困境，却可能从未真正从这些伤痛中恢复。在看不见的地方、不为人知的心底，那些阴影仍若隐若现。

同一类故事和人物的反复出现，暗示了一种心理情结的可能，这有点像弗洛伊德在《精神分析引论》中所说的：“假若一种经历在短期内给心理提供一种强有力刺激，致使心理再也不能用正常的方法来应

付抑或适应，并导致心理的能量分配方式受到永久性的干扰，我们称这种经历为创伤的经历。”在这个意义上看，写作实际上展现了一种“故事的疗愈力量”，通过反复重述过去的坎坷经历，并让人物完成克服磨难的升华，从而实现疗愈心灵的作用。曾经的创伤成为作家走上写作之路的原点，助其产出绚烂的文字，而写作本身又反过来抚慰着可能仍在隐隐作痛的伤痕。

只是，作家将笔触过多用于描写作为自身情感寄托的女性形象，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男性形象的塑造。小说中的男性要么成为女性成就自我的辅助者，要么沦为陪衬物。这样看来，邹世奇笔下的女性其实脱胎于一部文学经典——《简·爱》。简·爱从童年的阴影中走出，自食其力，最后赢得了罗切斯特先生的爱慕，这与竹青们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。实际上，邹世奇的写作并没有刻意凸显性别，但作家的情感投射过于集中在女性人物身上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小说色调的偏差，多少使之流于自怜的情绪。

小说集中为数不多的几篇脱离这一叙事模式的作品，显得尤为可贵。《雕栏玉砌应犹在》《犹恐相逢是梦中》为历史题材，都关注明金陵的变故，呈现两条互补的脉络。《雕栏玉砌应犹在》写贵族子弟的落魄，重点放在谋生的不易，抽离了宏大叙事，而聚焦于日常生活；《犹恐相逢是梦中》写金陵女子的家国情怀，将个人情爱升华至民族大义高度。《白昼幻影》关注校园，主人公却是一群读研的工科男生，这次作家更沉潜至男性的心灵深处，换了一副调侃、俏皮的笔墨，展现了与《牧马河之夏》等迥然不同的风貌。这些都显示了邹世奇的写作潜力。显然，她具备足够的敏锐度与观察力，去表现自身生活之外的世界，而从此出发，邹世奇可能走出更宽广的写作道路。

（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
顾拜妮的中篇小说集新作《乳酸菌女孩》共有五个故事，涉及都市、女性、职场、婚恋等主题。作者将现代生活的日常碎片拼合起来，让人看到生活底部沉积已久的观点淤泥正不断泛起，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搅扰人生本该清澈的水体。

水，这个小说集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好像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喻体，它无形无色、无处不在，包裹每一个个体，可其中总藏有不可预测的风险。同名小说《乳酸菌女孩》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，表面如水般轻柔，深处又像水般激越。这是一本轻与重并存的作品集。

说到“轻”，恐怕没有什么比城市中人们的相遇与离别更加飘忽不定。当人类社会发展出“都市”这一居住形态，这一人类聚落便以偶然、瞬间的人际关系彰显出其与乡村的区别。流动性是都市的灵魂，于是，遭遇了都市的波德莱尔，提笔写下诗《异乡人》。在19世纪的巴黎，人们皆是“谜一般的”“无父无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”的“异乡人”，万物流散，唯能欣赏与把握的，只有天际的云彩。这是关系的疏离，也是心的疏离。

这本描摹都市生活的小说集，收集了种种短暂与偶然的命运交汇：女孩们合租，短暂停驻于一处，熟悉后又互相告别；钢琴教师通过邮件联络敬仰的艺术家，走进对方的生活后，又因坚守道德不愿逾矩而退出；陌生人来来去去，借由工作、旅行踏入个体熟悉的生活半径，再经由迁徙，抑或命运，退出各自的生活范围。

即使在看似稳固的婚姻关系中，作者也觉察到了人际纽带的脆弱易碎。比如《尼格瑞尔》，邹柚帆与前任女友雯雯分手，就因为邹柚帆坚持在生活中“稳稳地握住方向盘”，而雯雯却认为真正的爱能够为对方改变既定的人生规划。这样的理念碰撞并未从邹柚帆与妻子贺佳莹之间消失，自由而多样的观念，使理解彼此成为难题，怀疑、猜忌潜滋暗长，当理念框架互相撞击后，遗留的便是“愚蠢、狭隘、不堪”。

都市让人们相遇，也不断制造离别。通过人际关系来确定自身的位置，成为一种现代性的虚妄。当人们无法在稳固的人际关系中确认自我，那么职业便成为获取自我认同的主要方式。作者觉察到了这一点。小说集中的五个故事涉及图书编辑、钢琴教师、美人鱼演员、花艺师等职业，这些工作平凡却又不可或缺，这种不可或缺不是指它们满足了都市人群温饱外的余裕需求，而在于它们所承担的功能。在小说中，这些工作的价值不在经济层面，而在于它们是人们安放内心的理想空间。

《乳酸菌女孩》的主人公信子枫经历漫长的求职后，逐渐认识到自己厌恶功利性的八面玲珑，“希望笨拙和诚恳能够不被伤害”，于是她舍弃能够获得高薪的保险行业，选择成为一名花店店员。《水形物语》中的秀妍经历了丧子之痛，她从公司职员转行成为一名水族馆美人鱼演员，与水与鱼相伴的工作，帮她纾解了内心的痛苦。《绿光》里，钢琴教师罗佩拒绝了艺术家穆先生的“引诱”，也拒绝了来自社会更高阶层的虚伪的橄榄枝，她辞去穆先生儿子的家教工作，选择依靠自己的技

能谋生。《合租女孩》里独自漂泊在外的女孩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“公司竟成了最有归属感的地方”。价值的判断、内心的倾向被寄放在工作中，主人公遭遇“人”的挫折时，往往将“工作”视为疗愈自我的方式。这些工作在社会结构中十分微小，但对个体而言却具有巨大的内在支撑作用。

但工作也只是途径，重要的是自身对爱与真的确信。作者一次又一次回到这里，让我们看见主人公——同时也是生活中的我们——从昏暗走向清明的过程。《水形物语》的主人公秀妍失去了孩子，丈夫汉文没有抱怨和愤怒，更没有眼泪。秀妍不能理解汉文的状态，于是与他离婚。但她逐渐发现痛苦与克制可能同样是爱的表达，这只是不同人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的不同。这样细微却深刻的观察在小说集中比比皆是。作者是抽丝剥茧、层层罗列，将这些城市多样化际遇下的观念差异描写得纤毫毕现，让我们清晰地看到，人与人之间的阻隔是如何被制造又如何缓缓散去，直到在痛苦的眼泪中，看到对爱与真的确信。

仔细想来，五篇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处的形象总是坚定的，带有细微的昂扬。这让我再次想到了波德莱尔的诗，《那个漂泊不定的异乡人》找到的确定是“那边……那边……奇妙的云彩”。《乳酸菌女孩》中的主人公们所相信的并非如此虚幻之物，她们的

确信真挚、牢固，抵御着城市中四散漂流的风。这些磐石般的确信，是作品中“重”的部分。福楼拜认为：“作家在作品中必须像上帝在宇宙中那样，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。”作者的叙述轻松简洁，仿佛这些都市碎片，本身也就栖息生长于小说集中。我们看不到作者的身影，但又处处是细腻的笔触，那些清晰逼真的描绘，近乎完成了一场现实的“还原”。

但是，我想说的并不是写作技巧层面的问题，而是：这些故事就是真的，是作者，是你我，是现在内心的持续呻吟和隐隐作痛。

（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）



《乳酸菌女孩》，顾拜妮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5年5月